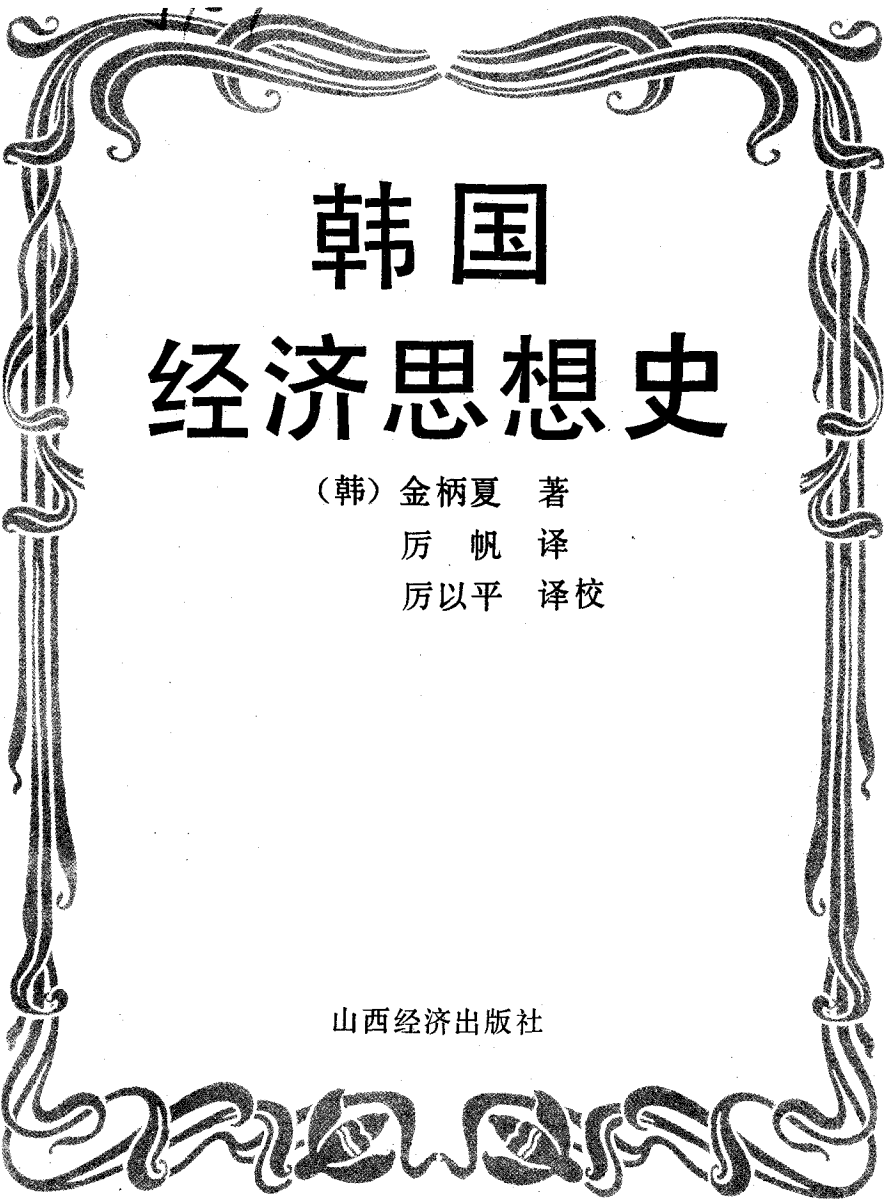




韩国 经济思想史

(韩) 金柄夏 著
厉 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山西经济出版社



韩国 经济思想史

(韩) 金柄夏 著
厉 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新登字4号

韩国经济思想史

〔韩〕金柄夏 著

厉 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

山西经济出版社 (太原并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59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

ISBN 7-80577-542-7

F·542 定价: 8.00元

卓
白
冬
之
月
本

序 言

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思想是经济事实的反映,而经济事实又往往随着经济思想的更新而变化,所以通常应对二者进行相辅相成的研究。然而,历来的韩国经济史研究却忽略了对思想史的研究,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韩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出版问世。

笔者曾试图从国际的角度对韩国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李朝前期对日贸易研究》,但当领悟到韩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后,笔者转向了这一领域,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笔者在庆熙大学、外国语大学授课时的“韩国经济史”讲义,在淑明女大研究生院执教时的“韩国经济思想史”讲义便是这项研究的部分成果。不可否认这些讲稿对本书的完成有不少帮助,不过本书主要是由本人自1973年7月至1977年4月在《财政》杂志上连载的文稿增订而成的。在为《财政》杂志撰稿时,只在自认为必要的地方做了一些注释,本书亦是如此,通过上下文可以推猜资料出处的,或是象《朝鲜王朝实录》、报纸等在行文

中已标出年月日而毋需注释的地方，大都将注释略而不录。

在撰述本书时，笔者自始至终坚持引经据典客观记述的宗旨。这虽实属史家常识，但因思想史研究尤其可能出现主观随意性，因此不得不始终关注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次问世的《韩国经济思想史》特别需要这种记叙方法。

本书由经济思想的展开篇和经济思想家篇构成。在经济思想的展开篇论述了高丽至旧韩末期经济思想的展开过程及韩国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思想家篇论述了李朝初期至末期主要人物的经济思想。笔者认为韩国经济思想是自高丽朝之后开始具体展开的，故而本书从高丽的经济思想入手，不过笔者关于高丽朝以前经济思想的想法在第一篇第一章中也间接地有所反映。

拙著自动笔伊始便得到了恩师、先辈以及同学诸君的惠助。在出版方面则承朱宗桓博士的力荐及一潮阁韩万年社长的厚意，借此机会一并致以谢忱。

著者 金柄夏

1977年8月1日

于高凰山麓教授会馆211号

目 录

第一篇 经济思想的展开

第一章 高丽时代的经济思想·····	(1)
一、经济思想的概观·····	(1)
二、农业和土地制度论·····	(8)
三、商业和金融论·····	(16)
四、货币论·····	(23)
第二章 李朝前期的经济思想·····	(32)
一、经济思想的概观·····	(32)
二、农业和土地制度论·····	(39)
三、商业论·····	(46)
四、货币论·····	(54)
第三章 李朝后期的经济思想·····	(62)
一、经济思想的概观·····	(62)
二、阶级论·····	(69)
三、土地制度论·····	(76)
四、农业论·····	(84)
五、商业论·····	(92)
六、货币论·····	(99)
七、财政论·····	(107)
八、度量衡制度论·····	(114)

第四章 李朝末期的经济思想·····	(124)
一、经济思想的概观·····	(124)
二、农业论·····	(136)
三、商工业论·····	(144)
四、货币论·····	(151)
五、财政论·····	(159)
六、人力开发论·····	(167)
七、经济史论·····	(174)
第五章 韩国的经济学·····	(183)
一、韩国经济史学的发展·····	(183)
二、韩国经济学的发展·····	(192)

第二篇 经济思想家

第一章 15—16世纪的经济思想家·····	(201)
一、郑道传·····	(201)
二、金时习·····	(209)
三、李珣·····	(216)
第二章 17—18世纪的经济思想家·····	(225)
一、李睟光·····	(225)
二、柳馨远·····	(232)
三、李穡·····	(241)
四、郑尚驥·····	(249)
五、李重煥·····	(257)
六、柳寿垣·····	(265)
七、安鼎福·····	(272)
八、禹禎圭·····	(280)

九、洪大容·····	(288)
十、朴趾源·····	(295)
十一、禹夏永·····	(303)
十二、朴齐家·····	(311)
十三、丁若鏞·····	(320)
第三章 19世纪的经济思想家·····	(329)
一、金玉均·····	(329)
二、俞吉濬·····	(336)
三、朴泳孝·····	(345)

第一章 高丽时代的经济思想

一、经济思想的概观

1. 思想界的概观

韩民族所固有的思想溯源于原始宗教。在文化水准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往往相信神灵的存在，信奉神灵附在自然万物或人体之上施加影响的泛灵论，并奉行巫术与禁忌等，这种思维痕迹在韩民族的神话中也保留着。即使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原始宗教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崇拜天神和土俗神则成为重要的日常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影响，韩民族固有的思想也不断变化。对韩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外来思想有儒教、佛教、道教等。新罗时代盛行的花郎道思想是受到这种影响并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除此以外，中国传入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古朝鲜之后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都给予了极大的影响。阴阳五行思想认为一切物质系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一切元素都由气形成，气又分阴气与阳气。在中国，到了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与宗教相结合而逐渐神秘化，在韩国阴阳五行说也作为一种神秘手段，长期地规范制约着政府和民间的行为活动。新罗统一后，

道说的风水地理说广为流行。风水地理说认为地势和地形与个人和国家的吉凶密切相关，与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相符合而甚为流行。

儒教虽然被认为早在古朝鲜时便与汉字一道传入，但由于当时理解儒教、认识汉字的人数有限，因此直到三国初期才成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高句丽于小兽林王2年（372年）设立大学（国立学校），讲授五经、三史等经典；百济也普及儒教教育，公元285年王仁博士携带《论语》及《千字文》前往日本，致力于儒教和汉字的传布；新罗到六世纪广泛普及儒教。儒教传入新罗虽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但却更快地扎下了根，神文王2年（682年）设立了国学，元圣王4年（788年）制定读书三品科，录用合格者为官员。

高丽的历代君主因循新罗的崇儒政策。太祖虽笃信佛教，但在西京设立学校奖励儒学，光宗创设科举制度，推广儒教。但儒教名声大振还是在成宗以后。成宗时，设制国子监，奖励儒学。对成宗的崇儒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当数崔承老，成宗元年（982年）崔承老用流畅的汉文，呈递了一份长达20余条的时务论，在礼、乐、诗、书、君臣、父子的道理中还包括应适当模仿中国的内容。与佛教相比，崔承老更重视儒教，佛教是净身之本，儒教则是治国之源，因此他主张与其信奉为来生而净身的佛教，不如选择可以解决紧迫问题的治国之本。^①为了强有力地推行崇儒政策，势必要终止佛教及燃灯会和八关会等膜拜土俗神的国事活动。虽然崇佛及燃灯、八关等活动与太祖训要十条中包括的国事相符，但崔承老建议应减少这种消耗国力民力的燃灯会和八关

①《高丽史》列传，第6卷。

会。成宗采纳崔承老建议终止了燃灯会和八关会，更努力地传布儒教。

成宗时设置的国子监长期不振，与此同时私学却蔚然兴起。私学是文宗时由崔冲开创的。此后，开京又新设11所私学，这12所私学致力于普及儒教教育，其中属崔冲的私学影响最大。

此后的武人专政及战乱时期，儒学停滞不前，但忠烈王时，安珦随同国君赴燕京，得到《朱子全书》，回国后致力于儒学的振兴。程朱学就这样由安珦首次传入韩国，而由李齐贤、李穡、郑梦周、郑道传所继承。

儒教作为外来思想是以仁为理想、实现修己治人之道的道德政治思想，而同为外来思想的佛教则作为宗教而发挥独特影响。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教祖释迦是印度迦毗罗国的太子，他不贪恋荣华富贵，为解除生、老、病、死的烦恼而遁入深山苦行。在苦行修道之后他终于大彻大悟，获得身心自由解脱。他认为人的存在基于欲望，欲望根源于物心，宇宙万物皆依因缘而出现存在，变动不居，如果对此持达观态度，便会从苦恼中解脱，能对一切恩惠报以感激地生活。

佛教在三国时代传入韩国。佛教虽然早就传入高句丽，但到小兽林王2年（372年）才为国家正式接受。这一年，前秦的顺道携带佛像与佛经来到高句丽，两年后阿道也来到韩国。由于中国僧侣的到来，高句丽创设了省门寺及伊弗兰寺，致力于佛教的传布。据安启贤教授认为，在当时中国的佛教界，作为主流的是以原有的老庄思想为媒介的所谓善因善果的因果教理，所以高句丽最初接受的佛教也是因果教理的佛教，甚至是求福的佛教，与历来的土俗信仰一脉相通，神佛合一的佛教信仰占主流，三国中谁最先形成新观念形态，谁就能最先抓住形成中央集权的古代

国家的契机。①

佛教传入百济比高句丽晚12年。枕流王元年（384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从晋而来，介绍佛教教理。百济的佛教也象高句丽一样是与土俗信仰混合为其特征而发展的，百济的佛教全盛期历经圣王、法王、武王三代，圣王30年（522年）佛教首次由百济传入日本。

佛教虽于5世纪通过高句丽传入新罗，但在氏族基础强大、只敬奉氏族神的新罗社会，外来宗教要想扎根决非易事。然而，从中央集权体制强化的6世纪起，随着贵族中信奉佛教的人数愈来愈多，佛教开始在全国传布，法兴王五年（518年），佛教被定为国教。

三国及统一新罗时代的佛教是护国的宗教，也是祈福的宗教。佛教原本是超国家的宗教，但在韩国由于它作为护国宗教而被接受，因而受到国家强有力的保护而广为传布；另一方面，它又作为在现世及来世赐福的宗教而为人信奉，因而得以迅速扎下根来，并赢得了众多的信徒。

高丽时期佛教继续受到保护。太祖王建笃信佛教，从高丽初起便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政策，光宗9年（958年）制定科举法，设置僧科，保护僧官，佛教进一步繁荣。此外根据国家对佛教的保护政策，许多世子也出家礼佛，象大觉国师义天那样卓越的佛教学者就代不乏人。

随着佛教信徒的急速增加，佛教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例如，佛教的禁忌杀生，虽然起因于佛教轮回转生及因果报应说，但其结果却促进了素食主义的膳食生活。

①安启贤：《韩国佛教史》（《韩国文化史大系》宗教哲学史篇第181页）。

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也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但高丽中期以后，僧侣日益堕落，借佛事之名诛求无已，宗派间的寺刹之争也时有发生。为了逃避兵役和租税，动机不纯而为僧者及犯罪者也很多。高丽末年，在儒教迅速普及、佛教日渐没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佛教排斥论。佛教排斥论由李穡、郑道传等几位学者首倡，尤其是郑道传站在朱子学的立场，否定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说、地狱说、祸福说，力主佛教排斥论。

除儒教和佛教外，道教也是有较大影响的外来思想。道教产生于中国东汉时代，以神仙思想为本，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卜筮、巫祝、谶纬和老庄之学，并受佛教的影响。其中有长生不老、禳灾祛病的方法，修炼成仙的秘术。道教传入我国是在高句丽荣留王7年（624年）。唐朝时，道士随同使臣来到高句丽传授老子理论，这是道教最初的传入。道教普及于三国，其中最崇尚道教的要算高句丽。道教经统一新罗时期传到高丽，高丽初期尊崇道教，甚至在宫中举行道教仪式，但中期以后，由于受儒教和佛教的排斥而未能有大发展，仅限于国王的祈祝，而未能发展成一般民众的宗教。

2. 经济思想

高丽的经济思想普遍受儒、佛、道教的影响，以儒教的影响最大。儒教虽象佛教和道教一样属于外来思想，但其三纲五伦的准则，修己治人的思想体系易于与经济思想相融合。从这一点看来，高丽的经济思想与新罗或李氏朝鲜差别很小。

农业被视为最重要的产业，土地作为生产粮食和衣料的生活基础而备受重视。所得水准越低，衣食的比重往往越比居住的比重大，其中食最重要，所以当然要奖励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农业。

不仅谷物连主要衣料也是农桑生产的结果，谷物布帛在充当交换手段的同时，也构成财政的重要部分，因此重农思想占有极重要地位。

当时，直接耕种土地的阶层是受支配阶层，其中既有拥有自己土地的具有良人身份的农民，也有奴婢身份的农民。无职役的农民称白丁，由于得不到土地，所以他们一般耕种公田或私田，交纳租税，余下的自己生活，成为佃户。奴婢身份的农民比一般农民更受轻视，此外还有与奴婢相应的乡、所、部、曲等贱民集团。当时的伦理标准认为身份差别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是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需要。

手工业和商业尽管被认为不如农业重要，但也被看作是必要的部门。不过抑商政策仍相当严厉。商业被认为比农业和手工业出力少而赢利大，因而出现了轻商的倾向。^①

金融业象商业一样也是早期资本积累的基础行业。当时也承认金融行为是正当的，认为一年征收本金 $1/3$ 的利息率是适当的。但认为复利及高利贷付最终会使债务者破产，从而动摇国家基础，所以政府规定利息的上限，禁止利息的积累超过本金。

高丽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铸币制度的国家，在货币思想上也有先进之处。这时已意识到铸币的可携带性、同一性、贮藏性、耐久性等优点，并把铸币看作是富国利民的手段，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财政上，租税是岁入的大宗，并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禄俸制度在文宗时臻于完备，尚书令禄俸为400石，中书舍人为200石，内住宅使60石，正阳殿侍卫18石。杂职、书史直至工匠等具有职

^①参考《高丽史节要》第35卷。

役之人则接受名为别赐的常俸。有关禄俸的规定后来几经修订，虽然在外敌入侵、府库空虚时，宰相的俸禄不过数斛，但高丽的俸禄是以文宗30年（1076年）为基准，大体考虑岁入与生计费用，按上厚下薄分配的。

官职原则上授予科举及第者，但忠烈王元年（1276年）以后，迫于财政困窘，实行了纳粟补官制。该年12月，由于收入不足，都兵马使提议实行纳银授官，无官品的平民要想入仕需缴纳白银3斤，8品官职之人要想晋升到7品，交纳白银2斤，以此类推。入粟补官制原来实施于元朝，韩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也照搬过来，加以仿效。

当时由于米布这类实物货币广泛流通，政府保管其所有的米布便成了问题。谷物更适于充当调节物价及救济贫民的手段，设立常平仓及义仓便成为历代王朝共同关心的事宜。常平仓及义仓制度实行于中国的汉代，这是一种在荒年能防止百姓饿死，丰年通过政府收买能防止谷价暴跌的理想制度，高丽也采用了这种制度。太祖时创设黑仓，成宗5年（986年）改名为义仓，并在几个州及府内设置，成宗12年（993年），在开京、西京及12个牧设置常平仓。义仓的设置以储藏谷物、荒年救济贫民为目的，设立常平仓则是为了调节荒年和丰年的谷价。

设立义仓和常平仓是为百姓谋求福利的，是一种善政。政治以养民为本，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食为本，义仓便是根据这一精神而创设的。荒年谷价暴涨，发放保管的粮谷以调节谷价，正与养民的原则相符，所以常平仓的作用与义仓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却往往与最初的目的相背离。由于谷物具有非耐久性，必须春天贷与，秋天回收，但运营上却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不能按期向缺乏种子可能耽误农时的农民贷谷，供给的

谷物搀有杂质而回收的谷物却要求品质优良等等。因此义仓、常平仓未能发挥最初作为救济贫民、调节物价机构的职能。虽然义仓及常平仓未能实现预定的目标，但国家对谷物储备重要性的认识却始终如一。国家如果没有粮谷储备，便被认为没有履行国家的义务，这个问题常常成为行政的中心课题。即不仅救济贫民、调节物价，储备种子和军粮也需要余粟制度。

为政者的善政还反映在各种恩免制度上。虽然荒年减免赋役租税是前近代社会的常事，但受儒教和佛教的影响，高丽历代国君都特别关心恩免制度。例如，成宗7年（988年）12月，规定遭受水害、旱害、虫害、霜害等灾害，田谷受损在4成以上的免征租税，在6成以上的免征租和布，7成以上则租、布、役全免，这被认为与赈恤鳏寡孤独病弱者等一道是政府应首先施行的善政和仁政。

二、农业和土地制度论

1. 农业经营的特点

高丽时代的农业一般属于牺牲地力的粗放式经营。此时，虽然已部分地采用了移秧法，但旱田比水田多，农业盛行粗放式经营。这一点可以从高丽的二圃式农法和三圃式农法中得知。

成宗11年（992年）规定公田税率时，将水田和旱田各分为上田、中田、下田，文宗8年（1054年）查定土地等级时，将一切农田分为不易田、一易田、再易田。不易田就是上田，一易田是中田，再易田是下田。不易田是可连年耕作的土地，一易田是需休耕1年的土地，再易田是需休耕2年的土地。一易田、再易田与中世纪西欧敞地制度实行的二圃制和三圃制很相似。

二圃农法和三圃农法在高丽时代广泛流行与肥料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高丽时代，富有的农家也不过只有一两头牛，贫农经常用耒耕耘，偶而借用一下别人的牛。^①当时牛耕虽已在全国推广，但由于无畜农家很多，即便是有畜农家，家畜数也很少，所以肥料的自给量小，加之肥料的运输十分困难，只能期待自然对地力的恩赐。

2. 农业论

农业尽管是粗放式的经营，但仍不失为当时最重要的产业。“农者天下之大本”的重农思想虽然古已有之，不过这时表现得更加具体了。农桑乃衣食之根本、王政之首务的思想贯穿整个高丽时代。农民如果不种谷物，不植桑树，便不能解决作为生活资料的衣食问题，衣食得不到解决，就会民怨沸腾、财源枯竭，国家便不能存续，因而历代为政者都实行重农政策，具体表现在强调农桑的重要性上。

国民乃国家之根本，根基稳固则国家平安，这一古老的命题从很早起便已成为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而老百姓“以食为天”，即把食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所以爱民思想与重农思想是互为表里的。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尽管地方官或衙前对农民横征暴敛，但执政者仍将重农政策与爱民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政府的重农政策有以下内容。在实行武器回收政策的同时实施的武器农器具化政策便有劝农的含意；国王举行祈雨祭，亲耕籍田，也是重农思想的表现；修筑贮水池，禁止在农忙期赋役，派遣劝农使，配给种子等也是重农政策的环节。

^①《高丽史》世宗，元宗3。